

## 1946年之後的黎烈文—— 兼論其翻譯活動

許俊雅\*

### 摘 要

本文討論 1946 年來臺後的黎烈文（1904-1972）及其翻譯成果。過去因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臺灣人士多數不瞭解黎烈文在 1946 年之前的一切，而黎烈文 1946 年之後在臺灣的翻譯、著述，亦是模糊難辨，在海峽兩邊的文學史論述裡，對黎烈文的正視及其評價，迄今未獲客觀公正的對待。因此本文透過其翻譯作品、家屬書信及相關文獻擬對幾個議題提出討論：「艱難的抉擇：去留之間費思量」、「二二八事件之後的黎烈文及其翻譯實踐」、「黎烈文對譯事的態度」、「志文出版社竄改黎譯之風波」。其中特別標舉臺灣政治環境對其譯作題材選擇的影響，他如何透過翻譯安頓身心，同時討論其人思想究竟是左翼文人還是左傾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關注其人命運，肯定其譯事功績，恢復其形象：埋頭寫作，不求聞達，不多取一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關鍵詞：黎烈文、翻譯文學、臺灣文學、巴金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 Li Lie-wen after 1946 - Regarding Hi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Hsu Chun-Y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essay focuses Li Lie-wen's works of translation after 1946, when he moved to Taiwan. Since Taiwan has long been separ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most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have little knowledge of what Li Lie-wen's activities before 1946. Moreover, his literary works and translations produced in Taiwan after 1946 have not been studied very thoroughly. To date, research o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ese Strait still lacks serious attention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Li work.

Through his translation work, correspondence with his relatives, and other related documents, this essay intends to discuss the following four issues:

- 1) His difficult decision to stay on Mainland China or to go to Taiwan;
- 2) His translation work after the Incident of February 28, 1947;
- 3) His attitude towards translation;
- 4) The incident of his translated works deliberately altered by the publisher Zhiwen.

Along these lines of discussion, emphasis is placed on how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Taiwan influenced his choice of texts to translate, how he found a place for his life by devoting himself to translation, as well as whether or not he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Left-Wing author or Libertarian.

This essay is concerned with his fate as a man and affirms his achievements in translation, with the hope of restoring his image as an intellectual who devoted his life to writing, seeking no fame, or wishing to take anything more than he deserved.

**Keywords: Li Lie-we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Taiwanese literature, Ba Jin**



# 1946 年之後的黎烈文—— 兼論其翻譯活動<sup>1</sup>

許俊雅

## 一、前言

早在日治時期的臺灣，《臺灣文藝》即載蔡嵩林〈中國的文學近況〉一文：「黎錦明和他的兄弟黎烈文雖然是斷斷續續的發表作品，可是也還守著文學的陣營。……他二人都是擅於短篇、中篇的作品。」<sup>2</sup>《臺灣新文學》〈消息通〉亦載：「中國著名的進步的作家魯迅、茅（按：宜作茅）盾、胡風、丘東平、孟十還、黎烈文等為提強進步的文學反對法西斯的文化反動、組織文化聯合戰線同盟會網羅全中國進步的作家開始了活動。」<sup>3</sup>這是 1935、1936 年間黎烈文的消息出現在臺灣的雜誌。時間流轉，經過 10 年，黎烈文踏上了寶島臺灣<sup>4</sup>，26 年後，並埋骨於此。在 20 世紀 40 年代後期國共兩黨政治、軍事決戰以及文化爭奪戰中，知識分子不得不考慮去留問題，做出與自身命運和國家前途相關的重大選擇，當時來臺的知識分子何其多，如羅家倫、梁實秋、臺靜農、孟十還、傅斯年、李何林、李霽野、錢歌川、陶晶孫、

<sup>1</sup>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臺灣翻譯名家譯作的蒐集、研究及數位化：以黎烈文、周學普、李魁賢、莫渝為重點」95-2411-H-003-029-MY2 部分研究成果。承蒙匿名審查委員詳細審閱，提供寶貴修改建議，筆者受益良多，謹致謝忱。

<sup>2</sup> 蔡嵩林：〈中國的文學近況〉，《臺灣文藝》2：7（1935.7），頁 189。

<sup>3</sup> 不著撰者：〈消息通〉，《臺灣新文學》1：7（1936.8），頁 62。筆者曾撰文討論過黎烈文 1946 年前在中國大陸編輯、翻譯活動，因此本文重點放在 1946 年之後來臺的黎烈文，面對臺灣戒嚴政治環境下，他以教學研究及翻譯安頓身心的歷程。

<sup>4</sup> 大部分資料記載黎烈文是 1946 年春來臺，但郭風〈記黎烈文〉：「黎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去臺的，因為我是在那年十二月底到福州。」《特區文學》1（1989），頁 116。因此黎烈文來臺時間有二說，尚待查證。未悉是否是新舊曆關係？1945 年舊曆 12 月，自然是 1946 年春，但如果 1945 年西曆 12 月底來臺，也有可能因船行時間，剛好跨過一個新的年度。

毛一波、毛子水、戴君仁、范壽康、吳克剛、周學普等等，黎烈文也是其中一位，但就其生命遭遇視之，黎烈文所受到的爭議、誤解、漠視，恐怕也是最難承受之重。國民黨政府視黎烈文為「左翼作家」，中共又污衊他為「墮落文人」、「反動文人」<sup>5</sup>，巴金對此謠傳誣陷不實之詞，始終耿耿於懷，力為好友辯誣。<sup>6</sup>文革結束之後，巴金以〈懷念烈文〉一文為黎氏所蒙受的無端屈辱予以雪冤，文云：「他並未發表過反動的意見……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遙遠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沒有向他的遺體告別，但是他的言行深深的印在我的心上，埋頭寫作，不求聞達，不多取一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sup>7</sup>巴金這段話事實上亦針對了樓適夷的意見提出反駁<sup>8</sup>，強調黎烈文並無「官氣」，只是一介不求聞達的書生。巴金在中國文壇德高望重，可謂一言九鼎，隨著時間的沉澱，污泥終於漸從黎烈文身上拭去，恢復其自身原來的形象——一個真正的黎烈文。<sup>9</sup>

過去因海峽兩岸的長期隔絕，臺灣人士多數不了解黎烈文在 1946 年之前的一

<sup>5</sup> 文化大革命時，某些現代文學的研究者在魯迅著作的註釋說他曾經是魯迅好友，後來墮落成為反動文人。也有人私下說《魯迅全集》的這一條註解，與黃源先生有關，意謂著可能是黃源先生所注。

<sup>6</sup> 可參陳子善：〈四見文學巨匠——追憶巴老〉，《素描》（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頁 4。

<sup>7</sup> 此文載錄各書，如巴金：〈懷念黎烈文——《隨想錄》四十三〉，《新華文摘》8（1980），頁 185-187。巴金：〈懷念烈文〉，《隨想錄》（北京：三聯書店，1982），頁 240。巴金：〈四十三 懷念烈文〉，《巴金選集》第 9 卷：新聲及其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頁 647。2009 年 3 月另有再版本。復見《巴金全集》第 16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頁 196-204。除巴金之作予以平反外，其餘如康詠秋、王西彥、趙家欣諸氏皆曾撰文撥偽返真，不過其中謂黎烈文為左翼、左派人士，黎氏家屬認為偏離事實，即使今日已經沒有了政治忌諱，家屬仍然頗為堅持。這一點從許粵華與子媳家書可見（家書為家屬提供筆者）。

<sup>8</sup> 樓適夷看到復旦年譜組訪問巴金的談話記錄，立即寫信給巴金，信上稱黎烈文「官氣十分，……或者稱做反動文人，也夠資格了。」（未刊，周立民於 2003 年提供複印本給筆者）巴金〈懷念烈文〉手稿原有「他（按，指樓適夷）並不曾列舉說服我的理由，……那位朋友並沒有被我說服，其實即使他相信了我的話（給說服了），他的話也起不了作用。」後來刪除這些細節。見周立民：〈不多取一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書信中的黎烈文與巴金〉，《書城》2（2008），頁 52-58。

<sup>9</sup> 80 年代中期，陳子善、王錫榮兩位學者在唐弢的指導下，精選從黎烈文接編《申報·自由談》後發表在《自由談》的優秀雜文，編成《申報·自由談雜文選》一書，請廖沫沙（原名廖家權，湖南長沙人）題簽，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唐弢特意撰寫了〈紀念一個友人——《自由談雜文選》代序〉，追述了他和黎烈文的友情，並以此文作為該書的代序。唐弢先生說「烈文與『掃帚文人作戰』。堅韌不拔，在浮言蜚語中度过一生，不把他人當踏腳板，曾無半句打扮自己的話。言行一致，溫文真率，他的提倡雜文，或許也正是這種精神的一個體現吧。」見唐弢：〈紀念一個友人——《自由談雜文選》代序〉，《魯迅研究月刊》3（1986），頁 19。

切，而中國亦因視之反動文人的緣故，黎烈文 1946 年之後在臺灣的翻譯、著述，亦是模糊難辨，在兩邊的文學論述上，黎烈文展現的翻譯文學成績都只是「一半」的，臺灣學界不理解黎烈文前半生在大陸的譯事，大陸學界也不清楚黎烈文後半生在臺灣的譯績，其人其事幾乎不為人所重視，或仍常欠缺公道的評價。至於黎氏來臺後的譯著有部分由志文出版社出版，但當時遭出版社任意竄改，家屬提出尊重譯者，恢復譯文原貌，但迄今仍未獲重視。因此本文除敘述譯著遭竄改一事，擬對幾個議題提出討論：其來臺緣由、不涉政治而專注譯事，以及其譯事態度，尤其是來臺後特殊的政治環境對其譯作題材的選擇、評述與在大陸時期是否有不同等等。

## 二、艱難的抉擇與其思想傾向

1948 年前後，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與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困惑，從理想的追求到艱難的選擇，他們往往都有一段複雜而曲折的心路歷程，其前途之茫茫，憂心之忡忡，其不安之焦灼，其人物之眾多，背景之複雜，其選擇之多面，去留之間之費思量，我們今天看起來仍禁不住感慨萬端。1948 年前後知識分子的不同心態和不同選擇（或渡海來臺、失望出走或觀望等等型態），正反映了他們對國共兩黨的不同認識，也反映了他們在政治格局大變動中的取捨。當時黎烈文也同樣面臨渡海與留守的情境，黎烈文來臺緣由，巴金曾說：「他當時因與黃源的前妻許粵華結婚，感到不大好意思見文藝界的朋友，才去臺灣的。我 1947 年去臺灣時見過他，他在那裡生活並不好。」<sup>10</sup>這固然是深知內情之言，亦是人之常情。但恐怕也只是其因之一。

戰爭末期，黎烈文處於政治形勢惡劣肅殺的氣氛裡，又逢羊棗事件<sup>11</sup>，他向趙

<sup>10</sup> 上海師大中文系魯迅著作注釋組：〈訪問巴金同志——談《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起草經過及其他〉，《新文學史料》1（1974），頁 74-75。巴金來臺時間約 1947 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中旬，見周立民：〈不多取一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書信中的黎烈文與巴金〉，頁 54。

<sup>11</sup> 1945 年 7 月，福建戰時省會永安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大逮捕事件。一個月中，國民黨政府在永安和福

家欣透露了其苦悶徬徨、想離開福建的心情<sup>12</sup>，等到抗戰勝利後不久，臺灣省省長陳儀邀請他來臺灣時，想必也有過一番思考，雖然我們不清楚他內心的想法與矛盾，但當時臺灣島上百廢待興，正是用人之際，很多赴臺的知識分子莫不心中充滿著建設「新臺灣」的熱情，何況光復初期的臺灣新聞出版界正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繁景。來臺擔任當時臺灣規模最大的報社《臺灣新生報》副社長，正可發揮其文化人的理想，這或許也是他選擇來臺的因素之一。報刊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立言的空間，「感時憂國」的自我期許，從「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鄧拓，到「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魯迅，到「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釗，近代中國有理念的知識分子總自覺地擔當起了社會文化重建的任務。渡海來臺的文化人及本地的知識分子正聯手建設著剛光復而滿目瘡痍的臺灣，這種情景，對於初履臺島的黎烈文來說，自然是令人鼓舞的。《民報》1946年2月5日（第118號）載「啟事」，新聞記者公會之組織，希新聞記者索取登記表登記。發起人除林茂生、黎烈文外，尚有葉明勳、陳旺成、李萬居、吳克剛、宋斐如等15人。4月21日（第2版）報導，得知黎烈文擔任「臺灣省新聞記者公會」的監事。熱情參與訊息仍時見，但終因其正直人格又在辦報方向與宣傳方針上與當局發生分歧<sup>13</sup>，黎烈文不得不於同年夏秋

---

建各地逮捕27人，連同5月初在浙江龍泉被捕的2人，共29人。另外，拘留和軟禁各一人。此案稱為「永安大獄」。其中，身兼共產黨員、記者、政治軍事評論家羊棗（楊潮）遭捕半年後被虐死獄中，故又稱為「羊棗事件」。羊棗擅寫雜文，非議時政，目光銳敏而文筆辛辣，當時黎烈文就在福建永安，此事件對其有一定影響。可參中共永安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羊棗事件》（出版地未註明，1989）。

<sup>12</sup> 趙家欣：《風雨故人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頁39。

<sup>13</sup> 儘管社長李萬居是他留法時的同學，兩人關係一直不錯，在報社中也有著不少進步知識分子，但《臺灣新生報》無論是形式或內容都受到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直接操控，雖然黎烈文名為副社長兼總主筆，但實際上對於報紙言論並無任何干涉的權力。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又視黎烈文為「左翼文人」，許多人對其頗不客氣，夏濤聲便是其中之一，黎烈師在致張介生的信中（1983.7.7）即寫道那時夏濤聲任臺灣省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總是盯著他這位『上海頂頂有名的左翼作家』，找岔子、挑毛病，時常跑到陳儀面前說他的壞話，遂引起陳儀的一些不滿。」引自康詠秋：《黎烈文評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175。人事關係的複雜再加上新聞出版愈來愈不自由，種種不如意使得黎烈文萌生了去意。這是1946年的夏末，距離黎氏剛到臺灣不過是短短的半年時間，此後他再也不曾涉足新聞出版界。另外，楊錦麟亦提到黎烈文辭職之緣由：「其中有李萬居留法同學黎烈文，黎原在福建省謀職，抗戰時期，一度在陳儀治下的福建省政府從事文化事業，黎是李的好友，曾主編上海《申報》副刊《自由談》，與魯迅亦有較密切往來，他由福建來

之間辭去職務<sup>14</sup>，秋，另任「臺灣省訓練團」高級班國文講師。田壽岡在1946年12月9日《臺灣新生報·新地》副刊寫了篇〈喜遇烈文〉，1947年1月15日《文化交流》〈介紹中國現代作家·茅盾〉謂茅盾「和王魯彥、黎烈文比鄰。」1948年《臺灣文化》編後記提到「由黎烈文先生的介紹，得登載諸侯先生的大譯『真文藝和假文藝』」<sup>15</sup>，3月時張明於《臺灣新生報》所發表的〈在臺灣的作家〉一文，認為黎烈文是光復後第一個來臺灣的中國大陸作家。<sup>16</sup>姑不論是否為第一位來臺作家，之後，有關黎烈文動態的報導就愈來愈少了。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及國共內戰惡化，許多左翼作家陸續遭到逮捕、審訊、倉促離臺，在許多知識分子紛紛離臺之際，巴金卻於6月20日至7月中旬來臺，而巴金離臺後不久，8月，黎烈文回過一趟上海<sup>17</sup>，「無憂無慮過了三星期，得與許多老朋友會見，非常痛快」<sup>18</sup>。此次回滬，他的本意還是想在上海找份工作。可是，時值國共和談破裂，內戰一觸即發，時局動盪，社會不安，上海已非久留之地，黎

---

臺，被聘為新生報總主筆。黎因與當時臺灣省政府新聞處長夏濤聲及新生報社經理部關係不甚融洽，辭去報職轉入臺灣大學任教。」見楊錦麟：《李萬居評傳》（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頁93。

<sup>14</sup> 不著撰者：《民報》第300號，第2版，1946年7月7日。載：「省署參議兼新生報副社長黎烈文氏，頃辭去新生報職務，聞不久將出任某文化學術機關要職。又訊，新生報新聘總編輯王克浪氏，即將由贛來臺。」按，王克浪著有《贛南三日行》（南昌：江西民國日報出版，1939），及《耳聞不如目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54）。另撰有〈解放前夕的《天下報》〉、〈一次出巡〉、〈《正氣日報》〉等文。

<sup>15</sup> 不著撰者：〈編後記〉，《臺灣文化》3：2（1948.2），頁18。黎烈文介紹諸侯譯作刊《臺灣文化》的來龍去脈，可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史料數位典藏系統資料庫，件名：李季谷、黎烈文、許世瑞寄至臺大信函。諸侯，本名陳清瑜，為一翻譯家。網址：<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Catalog/List.jsp?CID=32132>（2012年4月6日上網）。不過，陳清瑜宜作陳瑜清（1908-1992），浙江桐鄉烏鎮人，翻譯家，浙江圖書館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浙江分會會員，茅盾表弟。1932年自法國留學回國。

<sup>16</sup> 張明：〈在臺灣的作家〉，《臺灣新生報》第8版，1948年3月13日。

<sup>17</sup> 《文藝春秋》有〈迎艾蕪·黎烈文〉短文及兩張合影照片，文曰：「黎烈文先生自臺灣來上海。……黎烈文先生帶給我們的消息，說是：臺灣的文化目前是在真空的階段。半個世紀來，臺灣同胞已習慣於日文日語的寫說，現在既無日文的書報，又不能閱讀高深的華文，所以臺灣作家都在苦悶和沉默裡過日子，臺灣的讀者都在空虛和休息的狀態下消磨時光，這的確是一個文化真空的嚴重問題。」《文藝春秋》5：2（1947.8.15），扉頁，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此文後收入范泉著：《斯像難忘》（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頁43。

<sup>18</sup> 黎烈文致巴金信，由黎慰之女士提供。

烈文只得重返臺灣<sup>19</sup>，不久應聘為臺大文學院西洋文學系（後改外文系）教授，為了生計，又先後兼任師大、政大、東海及淡江諸院校有關法國文學之課程。在 1948 年時，蘇州社會教育學院新聞系主任馬蔭良專程赴臺，邀請他去該系任教，黎氏因故未能成行，至 1949 年春天又抱著「看看大陸上的情況究竟如何」回到了上海<sup>20</sup>，此後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大陸。1949 年 7 月大陸局勢緊張，胞弟黎烈師一家乘輪來到臺灣，與之同住溫州街寓所，後由黎烈文輾轉介紹，進入臺省公營工礦公司及公路局工作，大約暫避居臺島心意可見。女兒黎慰之說「他返回臺灣的原因，第一個我認為是當時一家大小都已經安頓在臺灣了，再搬回並不那麼容易，經濟上恐怕也不許可。其次是大陸政權直到他病重 1969 年還始終『未見天日』。當年他到臺灣的時候（1946 年），並不知道（或想到吧）臺海兩岸近半個世紀如同深淵一樣的分離的情況，就是要回去也不可能的了。更何況還輾轉聽到知識分子遭受迫害的事。」<sup>21</sup>這恐怕也是當時許多跨海來臺知識分子的共同遭遇，兩岸風雲巨變，海峽阻隔，故園難返，只能在斗室裡憂樂歌哭，心中難以割捨家鄉一切之沉痛，就像臺靜農在病人沉疴之際，仍然念念不忘渡海，贈友人詩云：「老去空餘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無窮天地無窮感，坐對斜陽看浮雲。」<sup>22</sup>

早在 1932 年他便開始著手翻譯了巴爾扎克（H.de Balzac）的一部小說《鄉下醫

<sup>19</sup> 曹聚仁曾云「我忽記起一九四七年冬天，我和黎兄相見時的話，他不想回上海來了。」或許是當時於上海未覓得工作，故又折返臺灣。見氏著：〈黎烈文在臺北〉，《天一閣人物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321。從這段話引發出一些問題，據〈迎艾蕪·黎烈文〉一文，黎烈文是在 8 月回上海，曹聚仁云「冬天」，可能有誤。其次是黎烈文是在 1947 年 8 月 1 日應聘臺大，可能心中仍依戀著上海，故在暑假期間再回上海看看是否有機會。最後是巴金〈懷念烈文〉一文云他到臺灣時居住黎烈文家，黎烈文當時在臺灣大學教書，並不受重視，生活也不寬裕。然則巴金 6、7 月在臺時，黎烈文尚未應聘，大約是已覓得臺大教職，但起聘要從 8 月 1 日始。巴金當時所看到的黎烈文，宜是在臺灣省訓練團高級講師時期。巴金此一錯認在〈關於麗尼同志〉一文亦同，該文云：「一九四七年我去臺灣旅行曾到臺北他們家作客，當時烈文在臺灣大學教書。」見氏著：〈關於麗尼同志〉，《隨想錄》，頁 69。

<sup>20</sup> 見曹聚仁〈我與黎烈文〉及〈黎烈文在臺北〉。後文云「1949 年春天，黎兄從臺灣到上海來，趙家璧、巴金諸兄宴之於某所。」參曹聚仁：〈我與黎烈文〉，《我與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頁 375；曹聚仁：〈黎烈文在臺北〉，《天一閣人物譚》，頁 321。

<sup>21</sup> 與筆者書函往來之語，2007.10.22。

<sup>22</sup> 臺靜農：〈老去〉，《臺靜農詩集》（香港：翰墨軒出版，2001），頁 70。

生》( *Le Médecin de Campagne* )，直到 1937 年始譯畢，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渡海來臺之際必然也潛藏著他心中對理想世界的想望，但時光流轉，新秩序的建立依然是遙遙無期，流離於亂世的人們的心靈磨耗，恐怕非經其歷難以體會。他也曾發出「這世界是不易生活的，死者未必可悲，生者未必可喜。」的悲嘆<sup>23</sup>，然而難能可貴的是殘酷的現實曾令多少人繳械投降，墮落為爾虞我詐、隨時俯仰的俗人，但他堅持不向外在壓力低頭，謹守譯事、教學之崗位，並對弱勢苦難予以關懷。

在有關黎烈文思想傾向的評述部分，或以「左翼文人」視之，而來臺後復又以「反動文人」冠之，這恐怕都遠不及其去世後《新晚報》之評述：「黎烈文已遺忘了他的一切、他在人間的恩恩怨怨，以及他的致命傷——自由主義。」<sup>24</sup>寒山碧說：「黎烈文倘若死心塌地的投靠了共產黨或者國民黨，可能被黨老爺捧到半天高，也可能被打下十八層地獄。不過絕對可以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活是靜悄悄的活，死也是靜悄悄地死。」對一位 20 世紀的自由主義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惡劣的政治鬥爭並沒有施展理想抱負的空間，不是在夾縫中掙扎圖存，就是堅持脊樑而導致的粉碎不堪，但「他終究沒有自行下跪，也沒有自擱嘴巴。」<sup>25</sup>黎烈文始終保持獨立人格和自由之身，這個「自由主義」的致命傷的標記，是如何的貼切及令人傷感。

對於黎烈文的思想傾向，有必要更詳細梳理。黎烈文在 30 年代從法國回來擔任《申報》副刊《自由談》主編的時期，是一位思想偏左傾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但不是左翼作家。在中國大陸，「左翼」是有特定含義的，指 1930 年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員，其實質是中共領導下的周邊組織，其代表作家是魯迅、茅盾、瞿秋白、馮雪峰、周揚、夏衍、胡風等人。但一般有反對國民黨政府傾向的作家並非都

<sup>23</sup> 《失鳴鳥·譯者序》，寫於 1952.7.28。[法]米爾 (Mille, Pierre, 1864-1941) 著，黎烈文譯：《失鳴鳥》(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64)，頁 1。

<sup>24</sup> 見寒山碧：〈黎烈文之死〉，《南北極》31 (1972.12)，頁碼不詳。後收入寒山碧：《中國作家作品瑣談》(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1984)，頁 57。寒山碧又說「『自由主義』當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的，但我們也不必拘泥於它的哲學定義，最通俗的解釋就是不賣身投靠任何黨或政治集團，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之身。莫非這就是犯了滔天大罪，要受到如此的懲罰？……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又豈能把濃泡描繪成蓓蕾，把謊言當作是真理？又豈能心甘情願地被人家當作猴子來耍？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下，一個帶有濃烈的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也許註定是要失敗的，註定是要寂寞。可是做人又怎能夠不要脊樑呢？」見氏著：《中國作家作品瑣談》，頁 58。

<sup>25</sup> 寒山碧：《中國作家作品瑣談》，頁 57。

是左翼人士，如巴金、葉聖陶、鄭振鐸等，都是左傾的自由主義者，黎烈文亦與巴金等人相同，是左傾的自由主義者，而非左翼作家。當時黎烈文擔任了《自由談》主編，力主改革，發表魯迅、茅盾等人的作品，是左翼作家利用他的左傾思想，擴大了左翼的陣地。魯迅晚年因為左聯內部矛盾，與左翼聯盟領導周揚決裂，隨之他主動團結了一批青年作家，其中主要是兩個團體，一個是青年左翼作家圈，如胡風、聶紺弩、蕭軍、馮雪峰等，還有一個就是左傾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巴金、黎烈文、靳以、趙家璧、黃源等。抗戰期間，黎烈文到福建辦改進出版社（後臺是陳儀），後來又因為陳儀的關係來到臺灣。陳儀亦是國民黨左派，反蔣介石，與魯迅、許壽裳的關係極好（都是留日學生）。後來許壽裳被殺、陳儀倒臺，黎烈文、臺靜農等等來臺灣的左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感受到處境險惡，又被目為左派（左傾），因此閉口不談政治，黎烈文沉默地翻譯了大量外國文學，臺靜農以詩書酒自娛。但是黎烈文到臺灣以後的身分又有些微妙，與他人遭遇不同。在 1949 年以後，大陸官方注釋《魯迅全集》，許壽裳、臺靜農都獲得認同，而黎烈文卻被歸為「反動文人」，似乎大陸官方並不認同黎烈文的左傾政治身分以及與魯迅的關係。

黎烈文做為一般的左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臺灣肅殺的政治環境，使他鬱鬱不得志，作品的內在價值也得不到官方的認同，他選擇了繼續翻譯以寄託他的感情，同時也是挺起一個家庭的謀生之道。

黎烈文也是愛國的民族主義者，而非階級主義分子，在《屋頂間的哲學家》退伍軍人對少年哲洛美說的一席話：

「你也許從來沒有想到過祖國是什麼，」他把一隻手攔在我的肩上接著說道；「這是環繞著你的一切，將你養育大的一切，你所喜愛的一切！你所看見的這片田野，這些房子，這些樹木，這些在那邊笑著走過的少女，這便是祖國！那些保護你法律，那償付你的工作的麵包，你所交談的言語，你從那些和自己共同生活的人與事物得來的快樂與悲哀，這便是祖國！你以前在那里看見過你的母親的那小小的房間，她所留給你的回憶，她所安眠著的土地，這便是祖國！你到處看見它，到處呼吸到它！你去想像一下吧，我的孩子，你的權利和你的義務，你的情愛和你的需要，你的回憶和你的感激，把

這一切集合在唯一的一個名稱下面，而這名稱便是祖國！」<sup>26</sup>

這位少年領悟道：

「啊！我懂得了，」我叫道；「這是擴大了的家族，這是上帝使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靈魂在這世界上依戀著的那片土地。」祖國就是故鄉、鄉土，讓人身心依戀的土地。<sup>27</sup>

他給女兒慰之的信提及自己在國外擇偶的心情及想法，說：

關於交男友的事，你告訴我們：「我不會嫁外國人的，放心好了！」有了你這句話，我就真的放心了。你的父親是個愛國者，我絕不願意自己家庭骨肉之間，出現一些非我族類的混血兒。我年輕在外國時，也曾有過和外國小姐結婚的機會，但我畢竟「懸崖勒馬」了。我極以遇著冰媽媽和你母親為幸福，以得到你們兄妹姊弟為驕傲，因此我也希望你們若一和外國人發生起友誼的感情時，要「懸崖勒馬」。<sup>28</sup>

許粵華給兒媳的信函亦強調：

爸祇是一位有正義感的愛國者，晚年且信了耶穌。而大陸上不了解他的人們，文革結束以前污蔑爸為「墮落文人」，文革以後雖經巴金以「懷念烈文」一文為他雪恥，但在文藝界仍常有欠缺公道的評價。有人出於無知而人云亦云，另有人則為欲鞏固一己地位而有意渲染，十之八九都將爸描繪成政治色彩非常濃厚的左傾分子。王西彥的「我所認識的黎烈文」，文中就有此傾向。<sup>29</sup>

信函時間 1992 年，黎烈文已過世 20 年，信亦是定居在美國時寄出的，無需考量可能因信件檢閱而有意遮掩或美化，家書本來也沒有公開的意圖，從 1967 年、1992 年家書呈現的黎烈文形象，就是民族主義愛國者，而非政治色彩濃厚的左傾分子。有些文獻提到黎烈文反對法西斯文化，後人解釋時習慣指向國民黨政府，但當時對

<sup>26</sup> [法] 梭維斯特 (Emiles Souterstre, 1806-1854) 著，黎烈文譯：《屋頂間的哲學家》(上海：文匯出版社，1997)，頁 112-113。此段文字，復見於黎烈文譯：〈祖國——愛的哲學之一〉，《文藝春秋》4 (1948)，頁 45-46。《屋頂間的哲學家》另名《愛的哲學》。

<sup>27</sup> 梭維斯特著，黎烈文譯：《屋頂間的哲學家》，頁 112-113。

<sup>28</sup> 黎烈文 1967.11.20 家書，由黎慰之女士提供。

<sup>29</sup> 許粵華與子媳家書，由黎慰之女士提供。

日本帝國的侵略，也是以法西斯斥之，因此所謂反法西斯即是反國民黨，是左翼之徒，此一推論不能不慎。

### 三、「二二八事件」之後的黎烈文及其翻譯實踐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聖經以賽亞書 42 章 3 節）這句話，是黎烈文生前所喜歡的，也可以概括他一生的寫照。

戰後初期的政治環境惡劣，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魯迅摯友許壽裳，突遭意外，被歹徒刺死於寓所（如前述）；接替許壽裳主任之職的喬大壯（1892-1948），也因鬱悶難遣而自沉身亡。臺靜農在〈記波外翁〉提起了當時政治高壓時期的感受，他不直述許壽裳命案對自己造成的恐懼，藉由他人話語，逼視自己心頭籠罩的陰影。他回憶自己和喬大壯一起走過許壽裳故居時，喬大壯忽然神情有異說：「這後面也許就有人埋伏著。」<sup>30</sup>從這句話，可以感知無所不在的監視對知識分子造成了心理上的驚懼與禁錮。不久，1949 年 4 月 6 日又發生消滅學生運動的四六事件（以臺大、師大師生為主），整個臺大校園風聲鶴唳，瀰漫著濃重的陰雲，沉重地壓在師生的心頭。生存在這樣的環境裡，黎烈文苦不堪言。此時，黎烈文恰好聽到了他的朋友、羅淑（1903-1938）夫婿馬宗融（1890-1949）病故於上海的消息，觸景生情，有感而發，寫詩一首寄給巴金。他在詩中憂憤地歎道「正值南天未曙時」<sup>31</sup>。1947 年他向巴金說「這半年來在臺北所受的痛苦，特別是精神方面的，這次都痛快地說了。」他還說「我一時既不能離開臺北，只好到訓練團去教點課……」又說「訓練團也混蛋，信既不轉給我，也不退還郵局，一直擱在那邊。」<sup>32</sup>其所受的巨大衝擊及屈辱傷害可以體會。隨著國民黨政府敗退於臺灣，全島為蔣介石所控制，島上的局勢十分緊張，政治空氣愈加令人窒息。之後，陳儀（已調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因曾勸湯

<sup>30</sup> 臺靜農：〈記波外翁〉，《龍坡雜文》（北京：三聯書店，2002），頁 74。

<sup>31</sup> 巴金：《巴金全集》第 16 卷，頁 198。

<sup>32</sup> 信函時間 5 月 19 日，原件影本由周立民先生提供。

恩伯向共產黨放下武器等等因素，遭蔣介石槍斃<sup>33</sup>，黎烈文也「因為原出版社的倪師壇、姚勇來等的問題，又幾次受到傳訊和調查，不免受些冤屈。幸好他一段時期以來，除了教書和譯書外，沒作其他任何事情，案子才不了了之。」他多次遭到審訊<sup>34</sup>，在政治上的高壓迫害下，黎烈文不談政治，專心教書、譯書，也不接受當局的籠絡，「有些機關派人前往黎府送錢，但深知黎烈文先生為人的黎太太怎樣說也不接受。」<sup>35</sup>

白色恐怖的肅殺之氣，和師友共同文化理想的建構已然失落，這讓黎烈文後半生不能也不願再公開談論和魯迅的文學因緣，以及文學信仰的價值存續。他的後半生已經幾乎看不見他走過五四、追隨魯迅學習的痕跡。甚至「為了免去不必要的困擾，家藏一本珍貴的魯迅譯的《死靈魂》也不得不忍痛付之一炬！」<sup>36</sup>雖然如此，他對自身角色的重新審視，以及對自己社會、歷史位置的重新確定，仍是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源頭的「五四」。他在書齋、校園裡，以另一種隱微的方式立足現實、直面人生，在溫柔敦厚之中自有一種耿介之氣，五四文學中的魯迅精神，逐漸內化為溫和雅致的文采與情懷，這是五四文學移植到臺灣後的接續與「在地化」。對於在時代壓抑下的黎烈文而言，如何保有清明之心，持續人文關懷，獨特的翻譯活動給他帶來一方空間。他接續了 1946 年以前即不曾停頓的翻譯志業，透過翻譯的實踐，他在精神層面上更接近了魯迅，傳繼了魯迅的精神傳統。作為法國文學翻譯家的黎烈文，正是在魯迅的鼓勵下開始譯介普羅斯佩·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1803-

<sup>33</sup> 康詠秋：《黎烈文評傳》，頁 186。

<sup>34</sup> 巴金〈四十三 懷念烈文〉：「後來我又聽到黎烈文牽連在什麼要求民主的案件裡被逮捕的流言。」見氏著：《巴金選集》第 9 卷：新聲及其他，頁 645。尉天驄在〈臺灣文學傳薪人：追念何欣先生〉一文中說：「那時候，文學界當然也很沉寂的。更糟糕的是這沉寂中還隱藏著殺伐之聲。記得有一陣子報上刊登著討伐一些前輩作家的言論，公開指責臺靜農、黎烈文等人是左派的同路人，是時局的『觀望派』，如果對反共大業再不表態，就應該送往綠島管訓。這種言論如果出自黨派團體，倒也可以讓人諒解，可悲的，這些殺伐之聲卻是來自一些文學團體，這就不能不讓人感到驚心了。」見氏著：〈臺灣文學傳薪人：追念何欣先生〉，《聯合報》第 37 版，1998 年 9 月 21-22 日。可見當時黎烈文、臺靜農等左傾的自由主義分子被歸類為「觀望派」、「左派同路人」。

<sup>35</sup> 巴金：〈四十三 懷念烈文〉，《巴金選集》第 9 卷：新聲及其他，頁 645。亦見於《巴金全集》第 16 卷，頁 203。

<sup>36</sup> 黎慰之與筆者往返信函，2005.1.18。

1870)。他在〈關於《伊爾的美神》〉一文中說：「在法國地城（Dijon）大學聽特拉西（Pierre Trahard）教授講梅里美，已是快近二十年的事；承魯迅先生鼓勵，在《譯文》月刊上開始介紹梅里美，也已是十三年前的事。」<sup>37</sup>到了臺灣之後，他又翻譯了〈雙重誤會〉<sup>38</sup>等，及〈梅里美評傳〉。他的女兒黎慰之透露「若是假以時日，他會準備出一套《梅里美全集》，但他實在走得太突然，太早了一點。」<sup>39</sup>觀其譯績，黎烈文對梅里美之翻譯確實佔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有幾個因素應該留意：一是梅里美強硬的文風，某種程度上恰似魯迅。面對疲弱不振的國民性，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梅里美更側重於「怒其不爭」，蔑視自己同胞的民族虛榮心。黎烈文敬重魯迅，在精神上也受其感召。二是梅里美以浪漫主義文藝戰士的身分出現，但他在揭露和抨擊現實方面比其他人更尖銳更露骨。黎烈文處於戒嚴時期下的臺灣，有口難言，就如梅里美對現實的不滿，心靈深處充滿了無法解脫的苦悶和矛盾，也因之嚮往真誠、樸實的人性及美好的社會。

黎烈文所選譯的對象，普遍呈現了此一心靈的寄寓，就像是心中漸漸散去的濃霧，光與熱的慰藉支撐著他繼續前進著，藉由譯著表達了他對現實關注的熱情，他對斯湯達爾、梭維斯特作品的翻譯，即是受其精神感召。所以《屋頂間的哲學家——愛的哲學》（*Un philosophe sous les toits*）中的主人公並不是隱遁在利己主義中，就如烏龜藏在甲殼中一樣，他相信任何與人類有關的事都不會和他無干。這也是黎烈文——一位在時代動盪面前不斷遭遇挫折卻始終不肯放棄理想的現代知識分子的真實寫照。

他曾說：「在目前這生活日趨艱難的時代，許多具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既不肯隨俗浮沉，蠅營狗苟，於是，這位住在『屋頂間』的窮苦哲學家的悲天憫人的懷抱，

<sup>37</sup> 黎烈文：〈關於《伊爾的美神》〉，《文藝叢刊》3（1947.12），頁8。此文又見田仲濟、蔣心煥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37-1949：散文雜文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6），頁866。另題作〈後記〉，收入《伊爾的美神》（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頁347。黎烈文此文中談到在《譯文》月刊開始介紹梅里美，指的是1934年8月在《譯文》創刊號發表了〈瑪特渥·法爾哥勒〉的中譯文。實則他最早介紹梅里美始於《申報·自由談》（1932.12.8）譯載了梅里美的短篇小說〈方形堡的攻克〉。

<sup>38</sup> 在這部小說裡，梅里美辛辣地諷刺了「文明社會」裡人性的虛偽和道德的退化。

<sup>39</sup> 黎慰之與筆者往返信函，2005.1.18。

及其安貧樂道的精神，便更加令人嚮往。我們這時候讀梭維斯特的這本書，不單可以稍稍忘記自己的痛苦，也許還會覺得有力量幫助那些比自己更加不幸的同胞。」<sup>40</sup>這精神與魯迅所啟示的正是一脈相通，魯迅逝世前夕，曾將凱綏·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1867-1954）親筆簽名的一幅〈德國的孩子們餓著！〉石版畫的原版拓本，贈給黎烈文。<sup>41</sup>圖的背面有魯迅直書的題記和署名，其相贈之用意是深刻的，黎烈文當也能感知。因為「飢餓的孩子的急切的索食，是最碎裂了做母親的心的」，要他「明白世界上其實許多地方都還存在著『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是和我們一氣的朋友，而且還是為這些人們悲哀，叫喊和戰鬥的藝術家。」<sup>42</sup>我憶起黎慰之曾傳述一則故事：「過去改進出版社同仁倪師壇身患半身不遂，兒子倪學全卻考上藝專音樂系，沒有錢交學費，跑來找父親幫忙，父親也沒有錢啊，知道他要學音樂，選的還是最冷門的低音大提琴，可是他沒有說甚麼。帶著那孩子挨家挨戶到他的熟朋友處去為他湊學費去了。到了第二學期又得從頭再來一次。」<sup>43</sup>這是黎烈文不為人知而自然流露出的對弱勢對朋友的協助與道義，可見他的人格和精神力量。他在〈一個不倦的工作者〉悼念魯迅之文，說：「別人不過從魯迅先生的著作受到他的影響，而我卻是近幾年來常常在他家裡走動，當面受著他的教益，得到他的鼓勵的一人。」「我只能把他當作是暫時的假睡，給予他的敵人們的一個嘲弄」、「大家都像魯迅先生一樣抱定一個理想，一息不停地工作下去，黑暗勢力的壁壘才有攻破的可能。」<sup>44</sup>他緊緊守護著這一信念，即使在他人人生最後幾年間，當高血壓血管阻塞病發，右邊

<sup>40</sup> 梭維斯特著，黎烈文譯：《屋頂間的哲學家》，譯序。

<sup>41</sup> 魯迅〈《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德國的孩子們餓著！（DEUTSCHLANDS KINDER HUNGERN!）。石刻，製作年代未詳，想當在歐洲大戰之後，據原拓本，……他們都擎著空碗向人，瘦削的臉上的圓睜的眼睛裡，炎炎的燃著如火的熱望。誰伸出手來呢？這裡無從知道。這原是橫幅，一面寫著現在作為標題的一句，大約是當時募捐的揭帖。後來印行的，卻只存了圖畫。」收入於魯迅編：《魯迅編印畫集輯存 1》（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頁 27。

<sup>42</sup> 魯迅：〈寫於深夜裡〉，《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第 5 集：散文一集（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未著錄年份），頁 155-157。

<sup>43</sup> 黎慰之提供之手稿複印本，2004.8.12。

<sup>44</sup> 黎烈文：〈一個不倦的工作者〉，《中流》1：5（1936.11），「哀悼魯迅先生專號」，頁 328。另見黎烈文著，陳子善編：《黎烈文散文精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頁 34。

手腳已經癱瘓之際，他拼命咬著右手，「口口聲聲這怎麼得了。我不能寫字了。」<sup>45</sup>這一形象力透紙背呈現了黎氏本人無以言比的震驚和頑強的抗爭，在生命的可能最後時刻裡，他仍然不放棄作為一位知識分子在翻譯著述上的努力與掙扎，而這不就是巴金所說的「埋頭寫作，不求聞達」的黎烈文嗎？

#### 四、黎烈文的譯事態度：信達雅、不掠美

翻譯的影響除了拓展知識分子的視野，還革新中國文學的形式。例如，林紓所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就擺脫傳統章回小說的束縛，革新了小說的形式。出版史料專家張靜廬更直陳：「闢小說未有之蹊徑，打倒才子佳人團圓式之結局，中國小說界大受影響」<sup>46</sup>。又如徐志摩等翻譯西方詩歌，影響中國現代詩的崛起。文學語言方面，翻譯文學為五四前後掀起的白話文運動，注入了養料，在寫作手法、題材選擇上，給予更多元的延伸。中國對翻譯文學的研究樂此不疲，臺灣則相對較不足。

臺灣戰後初期，文學翻譯曾繁華一時，尤其是日翻中或中翻日的現實需求，龍瑛宗、楊逵、林曙光都曾從事譯介活動。<sup>47</sup>後來又有黎烈文、周學普、李霽野、雷石榆、錢歌川等大陸來臺人士，投入世界文學的翻譯，但國民政府遷臺初期，文學翻譯幾乎宣告停擺，只能不斷刊登或出版大陸時代的舊作。一直到 50 年代中，紀弦、覃子豪、盛成、葉泥、侯佩尹、黎烈文等人投入文學中譯，60 年代有胡品清、施穎洲、方思等人，70 年代有杜國清、莫渝、非馬等。在戒嚴時代的氛圍之下，從事翻譯是人身安全及補貼家計的另一選擇考量，當然透過翻譯仍可將自身的理想傳達，黎烈文在譯本選擇上就是如此（如前述）。肅殺的政治氛圍，迫使黎烈文噤聲，但他選擇了法國文學的翻譯，藉由翻譯的推動，實踐他對國家民族以及人類的關懷，他

<sup>45</sup> 曾三（黎烈師）：〈懷念長兄黎烈文〉，《源流》1（1984.5），頁 44。

<sup>46</sup> 張靜廬：《中國小說史大綱》（上海：泰東圖書館，1920），頁 27。

<sup>47</sup> 中翻日情形，可參王惠珍：〈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論戰後初期（1945-1949）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臺灣文學學報》19（2011.12），頁 145-180。

極認真、慎重其事地面對翻譯，誠摯的態度讓人為之感佩不已。

周憲文<sup>48</sup>請黎烈文翻譯 *L'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 1884-1885*，在〈編者贅言〉可以印證黎氏一絲不苟的認真態度，此文說：

譯者把本書的校定樣交來之後，很嚴肅地告訴我：書中有地圖九張（應該為十張，原書缺一張，祇有九張）是否付印，這由編者負責決定。我當時感到這話來得奇突，以為是開玩笑的。校稿經過清樣，即將付印；我回憶起譯者那付嚴肅的態度，有點不放心，寫信去問他：這是當真的還是開玩笑的？他立刻回信：絕對沒有開玩笑的意思。這使我愕然了。試想！一本在 1894 年由巴黎 Delagrave 書店公開出版的法軍侵臺始末、我們在 66 年真是白白地過去了的？譯者拿這責任向我身上推，我去問誰呢？……不負責任的辦法，自然是把地圖刪去算了。管它的？但是，這樣做，至少就一本完整的書籍來說，是不很妥當的，是萬不得已的。讓它刊出吧，如果真有問題，這責任如何負得起！<sup>49</sup>

由此可見黎烈文忠於原著的精神，不擅自去取，變動原貌。該譯著書名為《法軍侵臺始末》，但黎烈文在〈譯者弁言〉特別澄清，依原書名中譯當作：「『1884 年至 1885 年臺灣的法國遠征軍』，日譯者板倉貞男譯為『佛軍臺灣遠征史』頗與原文意義相近，但我覺得站在中國人的立場，難以接受帝國主義者對被侵略者或殖民地所慣常使用的『遠征』之類的言詞，故依據史實，逕改為『法軍侵臺始末』」，他同時指出「日譯本常有漏譯及誤譯之處，且將原書附注全部略去，僅譯其最重要者編入正文中，以致面目大異，殊不足取。拙譯則一字一句，力求忠實，縱遇法人對吾國吾民有不遜之語，亦耐心一一譯出，以存全貌。」<sup>50</sup>

<sup>48</sup> 周憲文（1900-1989），浙江黃巖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畢業。1946 年 1 月應陳儀之邀到臺灣，2 月 5 日被時任國立臺灣大學代理校長羅宗洛（同鄉）聘為法學院院長，並兼南方人文研究所所長。同年 11 月，陸志鴻校長任內，南方人文研究所和南方資源研究所停辦，周氏轉任臺灣銀行籌設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任。任內期間頗有作為，創辦《臺灣經濟金融月刊》，主編《臺灣文獻叢刊》、《臺灣研究叢刊》、《經濟學名著翻譯叢書》、《西洋經濟史論集》、《西洋經濟學者及其名著辭典》，對於臺灣文史、經濟史料文獻尤有保存之功。

<sup>49</sup> 周憲文：〈編者贅言〉，收入〔法〕格勞特（E. Garnot, 1794-1838）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7。

<sup>50</sup> 格勞特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頁 5。

此外周氏請黎烈文翻譯 *L'î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 一書，亦言及黎氏對翻譯態度之慎重：「這本 C. Imbault-Huart 著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是黎烈文先生從法文翻譯的。關於著者的經歷及本書的內容，在 Huart 的自序及 Cordier 的弁言上，已有說明，毋庸再述。譯文的流暢，更不待介紹。其中有關人名、地名的翻譯，則承曹永和先生參與斟酌，極為慎重。」<sup>51</sup>這兩本譯作對了解早期臺灣歷史有相當大的幫助，身為湖南人的黎烈文對臺灣地名、語言自然較無法輕易掌握，但他絕不自作聰明，極其謙虛請教當時比自己還年輕許多的曹先生。甚至在《法軍侵臺始末·譯者弁言》即說：「本書內許多閩南音地名的翻譯，全出友人曹永和先生之助」絕不掠美居功。

穆中南在〈為黎烈文先生遺著出版祝賀〉一文，回憶黎氏校對《紅與黑》認真之精神，即使文中偶爾更動一二字，都是煞費苦心的。他說：

「文壇」本來是四人校三次半，第四校是我親自校對，我是外行，僅能稱得上為半次，二、三校都是專家校，都有二十年以上的校對經驗。尤其三校，是我的一個學生，家居臺中，必需函寄，他校對非常認真，手下的各種質料很全，如果發生問題，都在校樣上填註查證的意見供我參考。但資料也有錯誤的時候，有一次，他在「紅與黑」的校樣上寫了一些密密麻麻的意見，恰巧那期我因事忙未能四校即根據三校改正付印。「紅與黑」在「文壇」印好之後改廿四開版時再送黎烈文先生校第五次，黎先生在勘校工作上也很令人欽佩，有時發生問題不惜時間參閱原著及資料訂正錯誤。不巧那次的紅被黎先生看到，他給我寫了封信，對三校指出的各點逐一加以考證。我深深地敬佩黎先生的治學精神。<sup>52</sup>

對於翻譯，他態度誠懇，不掠美不掩飾。對版本的廣事搜集、對注解的不厭求詳以及對原作的力期信達。他每譯一部作品，都要撰寫一篇長文附在書的前面，對作家和作品進行獨到而又深入的評介。他自述翻譯技術方面，「我向來奉以自免的是：第

<sup>51</sup> [法] 印鮑脫·侯特 (Imbault-Huart, Camille, 1857-) 著，黎烈文譯：《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引文見周憲文〈編者贅語〉。

<sup>52</sup> 穆中南：〈為黎烈文先生遺著出版祝賀〉，《文壇》163 (1974.1)，頁 6。

一明白，第二忠實，第三漂亮。」<sup>53</sup>在《屋頂間的哲學家·序言》：「本書法文原名 *Un philosophe sous les toits*，直譯當作『屋頂下的哲學家』，所謂『屋頂下』(sous les toits)者，即是『在屋頂間』(dans la mansarde)的意思。因為巴黎市內房屋大都高六七層，最上一層直接處在屋頂下面，夏暑冬寒，甚難忍受；且從前沒有電梯，靠著兩腳上下，異常辛苦，有錢人是決不肯住的。所以，『屋頂間』也即是『貧民窟』的代名詞。現在為使讀者較易了解，並和原名不致相差太遠起見，譯作『屋頂間的哲學家』」<sup>54</sup>。在《邂逅草·前記》「譯文方面，有一點應當聲明：有幾篇論文，因為發表的便利，不免有幾處改換字面和不可避免的省略。」<sup>55</sup>可見只要稍有變通之處，一定對讀者加以交代。我們也從這裡看到一位譯家翻譯過程中的種種思慮、考量，似乎共同參與了過程，而非僅是譯後成果的分享。

其不掠美態度，經常呈現在譯者的後記或附記裡，有時特別用了「聲明」兩字，避免引發誤解。在《法國短篇小說集·序》：「這裡面未婚夫，晚風，董色的農光，他們的路，一個大師的出處，熱情的小孩等六篇，都是亡妻嚴冰之選的材料，由她譯過頭道，再由我根據原文加以詳細的訂正，然後發表了的。發表時的署名，因為當時的便利，有的寫著她的名字，有的寫著我的名字，有的則隨便寫著一個筆名。」<sup>56</sup>他主編《譯文》時，亦有編後之語——「後記」，對各種情況作一說明，如：「〈論莫洛亞及其他〉一文原名〈最後的拜占庭人〉(*Les Derniers Byzantins*)，我覺得這名字對於中文讀者稍為生僻一點，便依據內容，大膽地換了一個題目。這篇文章的有些地方是不能不採用『意譯』的方法的。」<sup>57</sup>在《屋頂間的哲學家》序言又特別交代說：「譯者因此不揣淺陋，……除開兩三篇的標題，照原文直譯稍覺冗晦，不得不採用比較自由的意譯，或體會原文通篇意義而逕為別立一名外，其餘文字方面……力求

<sup>53</sup> 見黎烈文選譯：《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法國短篇小說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3。類似話語又見於氏著：〈譯者的話〉：「我向來奉以自勉的是：第一要忠實，第二要明白，第三要美雅」，《法國短篇小說選》(臺北：志文出版社，1973)，頁1。

<sup>54</sup> 梭維斯特著，黎烈文選譯：《屋頂間的哲學家》，序言。又收入黎烈文著：《藝文談片》(香港：文藝書屋，1969)，頁97。

<sup>55</sup> [法]紀德(A. Gide, 1869-1951)等著，黎烈文選譯：《邂逅草》(上海：生活書店，1937)，頁2。

<sup>56</sup> 黎烈文選譯：《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法國短篇小說集》，頁1。

<sup>57</sup> 黎烈文：〈後記〉，《譯文》2：1(1935.3)，頁137。

忠實。」<sup>58</sup>又如翻譯法國戲劇家倍爾納（Jean-Jacques Bernard）的《妒誤》，他在譯後記中說「本劇原名，直譯應作『重燃壞的火』，因嫌累贅，沒改今名。」<sup>59</sup>譯文中難懂的典故、詞語、地名、人名、作品等，則加以註釋交代，這裡頭有他為讀者設想的，也有他自己遇到困難，實事求是的解決問題的認真態度而進一步註釋的。其譯著的註釋頗多，如《屋頂間的哲學家》：「設在達摩克萊斯之劍底下的盛筵啊，離開我吧！」「正像那補鞋匠一樣，我自從有了這致富的希望，便停止歌唱了；現在這希望走了，而快樂便回來了！」<sup>60</sup>他便不厭其煩地詳註。沒有這些註釋，讀者確實是有很大的閱讀困擾，透過這些註釋，對於譯文就能有更詳盡正確的理解與掌握。

從其譯事態度觀之，不分大陸或臺灣時期，他一以貫之負責任的態度從未曾改易。來臺後有些譯著重新再版，但如從他所新選譯的篇目或者所撰述的導論，仍然可以體會他特別注重於心理分析的作品。許鈞曾提及黎烈文先生執譯的《紅與黑》，附有序言一篇，長達兩萬餘言。評論的角度與大陸流行的幾個版本的序或有關專家的評論不同，黎作著重於探討該書的心理分析特色，題目就叫作〈《紅與黑》與心理分析〉。因此陳述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對同一部作品的認識是會有不同的。政治的、社會的因素無疑會對人們評價文學作品產生影響。黎烈文的評價與大陸諸家完全不同，關於作品的社會內容，階級局限性，他概不涉及。他也不採取作品所反映的階級鬥爭規律的認識視角。他所關注的是作品獨特的藝術特徵，用力分析的是作品本身的建構和人物心理的描寫之於小說藝術價值的關係。<sup>61</sup>他對梅里美作品的分析亦著重在情節上層次分明，構思巧妙情節、個性和藝術完美統一的結合體，作品顯示出了永恆的藝術魅力，他在借譯本宣傳愛國思想的同時，還表達了自己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追求文學審美價值的文藝觀。這樣的翻譯選擇和翻譯實踐本身，包含著作者對時代現實、對小說發展獨立的富於個性的看法、情感寄託和表達

<sup>58</sup> 梭維斯特著，黎烈文選譯：《屋頂間的哲學家》，序言。又收入黎烈文著：《藝文談片》，頁 98。

<sup>59</sup> 《妒誤》，書名原文 *Le feu qui reprend mal*，收入於黎烈文選譯：《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法國短篇小說集》，頁 93。

<sup>60</sup> 梭維斯特著，黎烈文選譯：《屋頂間的哲學家》，頁 31。這一段譯註補充達摩克萊斯其人及補鞋匠的故事。

<sup>61</sup> 許鈞：〈社會、語言及其它——讀海峽彼岸的《紅與黑》〉，《現代外語》1（1997），頁 38。

的方式。作為一個優秀的譯者，他以翻譯擔當起時代的苦難，並善盡知識分子的職責。

## 五、譯著被竄改過程

其翻譯態度認真，譯筆忠實、細緻簡潔、流暢傳神，使他在翻譯成就獲得甚高的評價，早為讀者所熟知。在《第三帝國的兵士》中，他正是以此將嘻笑怒罵背後的深沉悲哀細膩刻繪出來，深深嘲諷了希特勒對德國青年兵士的荒謬指引。他生動傳神地將《冰島漁夫》翻譯再現。將《西班牙書簡》以生花妙筆譯出，當時不知撼動過多少讀者的心靈，啟發過他們豐富的想像力。但作為一位 1930 年代即享譽文壇的譯家，進入 60、70 年代的臺灣社會，卻引發了出版社認為文字生硬、彘扭而逕自修改的行徑。

黎烈文的譯著，在大陸時就出版了不少，來臺後曾分別交由大業書局、重光文藝出版社、臺灣開明書店、文壇社等出版。在他去世的次年，前三家出版社同意解決出版契約，黎夫人許粵華<sup>62</sup>遂將 10 本譯著轉給志文出版社集中出版。志文在其後 9 年間（1973-1982），共出版了《法國文學巡禮》、《法國短篇小說選》、《伊爾的美神》、《雙重誤會》、《屋頂間的哲學家》、《魔沼》、《脂肪球》、《兩兄弟》、《冰島漁夫》和《拉曼邱的戀愛》等 10 本。其中以《冰島漁夫》銷售最好。後來有人發現黎烈文的原版譯著與志文版的有相當的出入，幾乎每本從劈頭第一句就遭到修改。更嚴重的是，志文不但修改黎烈文的譯著，連他撰寫的文字都予以改動或刪節，例如《法國文學巡禮》中〈斯湯達爾的心理分析小說〉一文，之前已收在文壇出版社的《紅

<sup>62</sup> 許粵華，筆名雨田，1912 年生，浙江海鹽人。兄許天虹是著名英美文學翻譯家。她亦擅長譯事，發表的譯作有日本鹿地互〈魯迅的回憶〉、內山完造〈魯迅先生〉、秋田雨雀〈高爾基之死〉、高爾基〈海燕〉、昇曙夢〈普式庚與拜倫主義〉、謝德林寓言《誠實的野兔》、蓋達爾《白季迦的秘密》、《臺灣鄉鎮之研究》、《十七世紀荷蘭人在臺灣的探金事業》等多種。散文成就又高於譯作，如追念陸蠡的散文〈期待著你回來〉等，大多描寫自然景物，傾訴心靈樂曲隨夫婿黎烈文來臺後，也在《公論報》副刊《日月潭》等刊物上發表過許多散文。

與黑》，但志文版已有大幅度的改動和刪節，又如《屋頂間的哲學家》、《脂肪球》、《伊爾的美神》、《法國短篇小說選》及《冰島漁夫》的序、後記、小引或作者評傳的文字，都遭到改動。此事在 1988 年 11 月時遭揭發，文壇及家屬一片嘩然，志文發行人張清吉則指出，當年他著手出版黎烈文的這批譯著時，志文的校對人員（多為國內三、四年級大學生或研究所學生）發現黎的譯文採直譯，「相當生硬、彘扭，很多地方看不懂」，他就授意校對修改，校對由於不懂法文，無法就原文進行核對，就直接就黎烈文的中譯文進行修改，以「流暢通順」為原則。張清吉認為：「譯者與出版社的想法有距離，前者往往認為忠實最重要，後者則認為能讓讀者看懂、看得下去才重要。而且黎先生的早期譯著，如《冰島漁夫》，用的是 20、30 年代的文體，與近代文體大有距離，為便利讀者閱讀，才予以修改。」<sup>63</sup>對於此種作法，學界都不以為然，臺大外文系教授王文興就說：

黎先生的翻譯堪稱林琴南第二。他的翻譯每個字都力求忠實，不肯為遷就中文而犧牲原文文字，甚至連標點、冠詞也不放棄。黎先生的中文非常好，出版社認為他譯文「不通」的地方，其實很多是古文、大陸地方方言和二、三十年的習慣用法。出版社把黎先生的譯作改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把他句子的美感、節奏上的效果，以及優美的風格破壞無遺，有些地方或許是意思未改，但藝術效果上是完全破壞了。這對黎烈文的傷害太大了。<sup>64</sup>

後來中央大學法文系教授黃景星亦撰〈請《冰島漁夫》做旁證〉，舉證說明黎烈文原譯本和志文修改本的差異，認為志文任意刪句子，而潤飾之處又將原文及譯文原意改錯。<sup>65</sup>凡是熟悉黎烈文譯著的讀者，都能深刻感受到志文出版社的竄改是極其大膽的行徑，也極其不尊重譯者，因為原作幾乎已經面目全非，筆者謹以《冰島漁夫》（*Pêcheur d'Islande.*）開頭一段描寫兩相對照，以見更動之痕跡，黎著原文

<sup>63</sup> 莫昭平：〈黎烈文譯著改頭換面 十餘年渾沌今朝曝光〉，《中國時報》第 22 版（開卷），1988 年 11 月 28 日。

<sup>64</sup> 莫昭平：〈黎烈文譯著改頭換面 十餘年渾沌今朝曝光〉，《中國時報》第 22 版（開卷），1988 年 11 月 28 日。

<sup>65</sup> 黃景星：〈請《冰島漁夫》做旁證：黎烈文原譯和修改本有何不同？〉，《中國時報》第 22 版（開卷），1988 年 11 月 28 日。

是：

那對於他們的身材實在太矮的住室，一端細小起來，同挖空的大海鷗的肚子一樣；這住室以一種引起睡眠的悠徐……照亮他們的是一盞搖來幌去的舊掛燈。……差不多觸著他們的腦袋……彷彿安置死人的墳穴一樣坦露在那裏……靠著頂裏面的板壁，在一個算是尊敬的地位，釘有一塊木板。<sup>66</sup>

志文版的《冰島漁夫》更改為：

這間和他們的身材比較起來顯得過份矮小的屋子，一端細小，宛如挖空的大海鷗肚子一樣，這時正以一種引人睡眠的悠忽……，照亮他們的是一盞搖搖欲墜的舊掛燈。……幾乎觸到了他們的頭頂……彷彿死人的墳墓般靜靜躺著。……靠裡面的壁上釘著一塊木板。<sup>67</sup>

從法文原文“trop bas pour leurs tailles”，並無比較起來如何之意，志文版的譯文將「實在太矮」改為「比較起來顯得過份矮小」，實是添油加醋。“et c'était une vieille lampe suspendue”也只是「搖來幌去」的舊掛燈，並無「搖搖欲墜」的意思。而“Contre un panneau du fond, une sainte vierge en faïence était fixée sur une planchette, à une place d'honneur.”黎譯為「靠著頂裏面的板壁，在一個算是尊敬的地位，釘有一塊木板。」是相當直譯忠實的譯法，志文版擅自減省了「在一個算是尊敬的地位」。舉此一隅，可以想見 11 冊譯著被肆意更改帶給家屬的驚懼與憤怒。而輿論也偏向出版社不應再發行這批擅自修改，已非黎烈文譯著的作品，宜重新恢復他的譯著原貌，讓讀者能讀到他真正風格的譯著。

只是張清吉一席話，讓人誤認黎夫人是同意志文的修改。因此許粵華及其子女多次發函給中國時報（當時信件未能原文刊出），指出並非事實，並強烈抗議未經對照原文而擅自改削又仍用原譯者的名字，是非常不忠實的行為。希望志文出版社不再發行這批擅自刪改過的「黎烈文叢書」，重新恢復它的原來面貌及風格。<sup>68</sup>歷此風波，志文出版社幾經考慮終於決定再版「黎烈文譯著叢書」時，將恢復其原貌。但

<sup>66</sup> [法]羅遜 (Loti, Pierre, 1850-1923) 著，黎烈文譯：《冰島漁夫》(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第一部 一」。

<sup>67</sup> 羅遜著，黎烈文譯：《冰島漁夫》，頁 31、32。

<sup>68</sup> 見莫昭平：〈還黎烈文譯著本來面目〉，《中國時報》第 22 版（開卷），1989 年 1 月 23 日。

風波既過，何時再版亦難掌握。<sup>69</sup>

此事件自然牽涉信達雅在譯事中所遭遇的困難，不同文化間的斡旋及不同時代的語文薰習，1970年代的年輕學子，對於老一輩文人的譯語，顯然有難以理解之處，然而這並非是黎烈文的錯誤，而是時代變了，語詞更為口語白話了，以致稍具文言、典故者即認為可能有誤，茲試舉黎氏譯著的文句以說明<sup>70</sup>，如在《西洋文學史》一書裡，就有讀者不懂，「詞鋒銳利莫當而又極易理解」中的「莫當」、「有時讀者雖然覺得他的劇曲多含詭辨」中的「詭辨」、「惜已殘闕，僅存悲劇部分」中的「殘闕」、「因此所作諷刺詩雖譏評時事，尚不致惹禍」的「尚」字、「衡以現代的史學眼光，自然有許多缺點」的「衡」字、「另一個在聽到戀人的噩耗時也義不獨生」的「義」字，甚至「作者在這裡刻毒地斥罵社會上一般居高位」的「刻毒」，有些讀者都覺得不通，在《拉曼邱的戀愛》裡，黎烈文使用「差可說」、「斧斤」、「無已」，在《莫泊桑選集》裡有「卑視」、「玩鈍」、「奧底」，在《紅與黑（下）》有「措意」，在詩作裡有「我想搜尋一幅彷彿伊的『畫裡真真』」等等，亦被認為有問題，因此當時出版社多所改易，整本譯著已面目全非，當然有些用法如：一斑、燬滅、播弄、那末、兜弄、一付、一只、傍邊、計劃、牠、狠（很）、重覆、霽圍、剏立、倣法這些詞彙有些是古籍的用法，有些是當時白話文初發展時的用法，為方便現代人閱讀而做了通行字的取代，此情況尚不至影響太大，較大爭議則是不顧原文的擅自取捨、增刪，因此顏元叔說：「要修改譯文，總得比對原文，怎麼逕自用中文來重寫一遍？」又說：「即使黎烈文真的譯得很壞，也應由學者專家以學術論文來討論，而不是叫大學生、研究生來改。另外，修改者的姓名也應當在書前註明，並寫個序說明修改的原因及方式。」<sup>71</sup>對於其譯作竄改現象，更全面的譯作分析比對，是龐大工程，當另撰文

<sup>69</sup> 經過此風波，加上晚近讀者對翻譯文學偏好的改變，志文出版社不再發行「黎烈文叢書」，但學界亦多半不清楚這次風波，上海大學陳子善曾自述 2001 年冬來臺參加臺靜農誕辰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會後拜訪張清吉，在其寓所檢出數冊臺灣版文學書刊，《迷藥》、《失鳴鳥》就在其中，他為自己無意中「搶救」了黎氏舊譯而深自慶幸。可知黎譯被竄改一事，多數人不清楚。陳子善：《邊緣小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頁 159-163。

<sup>70</sup> 以下文句不一一註明出處，請見筆者建置之網站「譯文網 Babel」。網址：<http://babel.ch.ntnu.edu.tw/Babel/company/company01.html>（2012 年 8 月 28 日上網）。

<sup>71</sup> 莫昭平：〈黎烈文譯著改頭換面 十餘年渾沌今朝曝光〉。相同意思另見莫昭平：〈黎烈文餘波 50 年

討論，此處不及。

## 六、結語

黎烈文先生自 1946 年到臺灣，中國大陸長期將他視為「反動文人」，而在臺灣，他又因為與魯迅的關係被視為左翼文人。學術界總結 60 年當代文學經驗教訓時，經常會發出「假如魯迅活著會有怎樣命運」的感歎，那麼，黎烈文如果生活在 50、60 年代的中國大陸，其命運有可能就與黃源、蕭軍、馮雪峰、巴金等相同，然而，本文提供的是一個相似的話題：黎烈文在臺灣的 50、60 年代又是怎樣的命運和努力，也許可以提供某種參照系。

黎烈文來臺前，在大陸曾主編《申報·自由談》、《中流》及參與抗戰文藝刊物《吶喊》、《烽火》的編輯工作來看，他的思想進步，但並未加入「左聯」，八年抗戰期間，他在福建主持官方的改進出版社工作，用刊物促進「舊社會的改革和新理想的實現」，他痛恨專制獨裁、黑暗，同情革命，追求公正合理。但這樣的一位當時文壇頗負聲譽的作家（譯家），卻因來臺的關係，不為共黨容納，而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又對魯迅作品查禁，在「四人幫」倒行逆施時期，不少有關魯迅著作的「注釋」中卻說曾經是魯迅友好的黎烈文「後墮落為反動文人」。<sup>72</sup>黎、魯二人密切的關係，連帶的也使黎烈文早期的文學翻譯活動受到忽略，其人其作在兩岸所受的重視實在太少。<sup>73</sup>黎烈文來臺後，過著安貧的學者生活，幾次受政治牽連，為當局傳訊、審

---

前的譯本現在還好讀嗎？》，《中國時報》第 22 版（開卷），1989 年 1 月 23 日。

<sup>72</sup> 原文：「黎烈無，湖南湘潭人，曾主編《申報》《自由談》、《中流》半月刊。後墮落為反動文人，1949 年全國大陸解放時逃往臺灣。」詳見魯迅：《魯迅全集》十：書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頁 335。

<sup>73</sup> 在魯迅生命的最後幾年，黎烈文這個名字頻繁出現在他的雜文或書信、日記之中。但後來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史，在提到《申報·自由談》的時候，都有意迴避了黎烈文。他成了兩岸的孤兒。此外，有關其筆名「達五」亦錯誤沿襲迄今。陳雲海〈「達五」是廖沫沙的筆名〉：「廖和黎烈文是同鄉、朋友，黎常約他為《自由談》寫稿，『達五』是廖在《自由談》寫稿的幾個筆名之一。」《新文學史料》4（1983），頁 131。廖沫沙〈我在三十年代寫的兩篇雜文〉亦提到用過「達五」之筆名，見《新

問，但仍始終保持知識分子的人品節操。死後，國民政府派人前往黎府送錢，但深知黎先生為人的黎太太怎樣說也不接受<sup>74</sup>，這正是巴金所認識的黎烈文的風範。

而生前曾享譽一時又長期被冷落的黎烈文的研究，應該也是受到正視的時候了。從 30 年代到 40 年代末，黎烈文處於動盪不安的轉型期，他從主編報刊雜誌、翻譯，最後回歸到翻譯與教學，從他的身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局對現代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抉擇的影響。他來到臺灣之後，雖然離開了媒體出版界，回到了單純的教學與翻譯上，對黎烈文來說，翻譯並不僅僅是在編輯事業受挫後的不得已之選擇，相反地，黎烈文的家人在談到他的翻譯工作時認為，這才「真正走回到他人生的正軌」，這或許也道出了某種真實。<sup>75</sup>

他繼續通過翻譯傳播自己的理想，與大陸文藝界的關係還是十分密切的，他在臺灣光復初期的許多譯作都發表於大陸雜誌，《依爾的美神》、《梅里美評傳》、《渥班牙神父》、《窗前隨感——愛的哲學之一》、《名勢篇——愛的哲學之一》、《祖國——愛的哲學之一》都刊於上海《文藝春秋》。譯作〈深刻的印象〉、〈手蹟的故事〉、〈母雞〉及散文〈關於郁達夫〉刊登於《大公報·文藝》，1947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伊爾的美神·梅里美選集》，列入《譯文叢書》，1949 年 8 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第三帝國的士兵》，列為《文化生活叢刊》。發表在臺灣刊物的，則有《臺灣文化》上的〈梅里美及其作品〉。居留臺灣的黎烈文，因此在臺灣的《文藝月報》、《中華日報》、《幼獅文藝》、《婦友月刊》、《人間世》、《文學雜誌》、《自由青年》、《暢流》、《文壇》、《徵信新聞報》、《純文學》、《新文藝》、《青溪》等都可見到其譯作及著述，並出版《筆爾和哲安》、《兩兄弟》、《法國短篇小說集》、《伊爾的美神》、《紅

---

文學史料》2（1984），頁 41。陳雲海為廖沫沙夫人。

<sup>74</sup> 詳見〈紀念黎烈文教授 賻儀轉贈復健中心〉：「黎烈文教授遺孀黎許粵華女士，昨日上午親至本報，將所收賻儀新臺幣五千元，託本報轉贈給振興復健醫學中心。這筆錢原是中央黨部社會工作會邱創煥主任所贈的兩千元，以及文化局王洪鈞局長所贈的三千元。黎教授夫人希望本報將錢轉贈給由蔣夫人創設在石碑的『振興復健醫學中心』，以嘉惠患有小兒麻痺症的下一代，並紀念黎教授生前幼幼之懷。黎夫人在本報表示，她對於中央黨部及政府各首長與各界人士的唁慰與關懷，非常感謝。」《中央日報》第 4 版，1972 年 11 月 30 日。

<sup>75</sup> 王小平：《跨海知識份子個案研究——以許壽裳、黎烈文、臺靜農為中心的考察》（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頁 95。王小平 2006 年接受中華發展基金會補助來臺蒐集資料，由筆者掛名臺灣方面的指導老師。

與黑》、《脂肪球》、《魔沼》、《冰島漁夫》等等，為外國文學愛好者提供了眾多精美豐富的譯著，使他們得以沐浴於巨匠大師們所創造的藝術世界之中。譯作中的《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及《法軍侵臺始末》二書，與臺灣關係密切，前者詳細記錄臺灣之地理位置、交通、物產、港埠、聚落及人種等，在中法戰爭中，為法軍攻臺的重要參考範本，後書紀錄法軍攻臺的始末，這兩本譯著特別呈現他對臺灣的關心，是很重要的翻譯成果。

觀其一生，雖然處境艱因為多，但堅守知識分子崗位，每一個時期都留下了可貴的心血結晶，縱使來臺後的黎烈文不是很如意，但因黎夫人許粵華的撫慰，在最後的人生旅途裡，他終於得以掙脫漂泊者的命運，尋著了失落了的精神家園，在沉沉黑夜中擔當守更人的角色，專注於譯著，並從事教育工作，指導青年，展現了一位學者和譯家的獨立和堅守的精神。

## 引用書目

### 一、原典文獻

〔法〕梭維斯特 (Emile Souvestre)，黎烈文譯：《屋頂間的哲學家》，上海：文匯出版社，1997。

〔法〕梅里美 (Mérimée, Prosper)，黎烈文譯：《伊爾的美神》，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

黎烈文：〈關於《伊爾的美神》〉，《文藝叢刊》3 (1947.12)，頁 8。

黎烈文：〈關於《伊爾的美神》〉，收入於田仲濟、蔣心煥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37-1949：散文雜文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6，頁 866。

〔法〕米爾 (Mille, Pierre) 著，黎烈文譯：《失鳴鳥》，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64。

〔法〕格勞特 (E. Garnot) 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法〕印鮑脫·侯特 (Imbault-Huart, Camille) 著，黎烈文譯：《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法〕紀德 (A. Gide) 等著，黎烈文選譯：《邂逅草》，上海：生活書店，1937。

〔法〕羅述 (Loti, Pierre) 著，黎烈文譯：《冰島漁夫》，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

黎烈文：〈一個不倦的工作者〉，《中流》1：5 (1936.11)，「哀悼魯迅先生專號」，頁 328。

黎烈文：〈黎烈文致巴金信〉，收入於陳建功編著：《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珍品大系信函卷》第 1 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頁 137-138。

黎烈文著，陳子善編：《黎烈文散文精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

黎烈文選譯：《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法國短篇小說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黎烈文譯：《法國短篇小說選》，臺北：志文出版社，1973。

黎烈文：〈後記〉，《譯文》2：1 (1935.3)，頁 137。

魯迅：《魯迅全集》十：書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

魯迅：〈《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收入於魯迅編：《魯迅編印畫集輯存1》，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頁27。

魯迅：〈寫於深夜裡〉，《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第5集：散文一集，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未著錄年份），頁155-157。

臺靜農：〈記波外翁〉，《龍坡雜文》，北京：三聯書店，2002，頁74。

臺靜農：《臺靜農詩集》，香港：翰墨軒出版，2001。

## 二、近人論著

上海師大中文系魯迅著作注釋組：〈訪問巴金同志——談《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起草經過及其他〉，《新文學史料》1（1974），頁74-75。

不著撰者：〈迎艾蕪·黎烈文〉，《文藝春秋》5：2（1947.8.15），扉頁。

不著撰者：〈迎艾蕪·黎烈文〉，收入於范泉著：《斯像難忘》，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頁43。

不著撰者：《民報》第300號，第2版，1946年7月7日。

不著撰者：〈消息通〉，《臺灣新文學》1：7（1936.8），頁62。

不著撰者：〈編後記〉，《臺灣文化》3：2（1948.2），頁18。

不著撰者：〈紀念黎烈文教授 賻儀轉贈復健中心〉，《中央日報》第4版，1972年11月30日。

巴金：《巴金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巴金：〈懷念烈文〉，《隨想錄》第1集，北京：三聯書店，1982，頁232-247。

巴金：〈懷念黎烈文——《隨想錄》四十三〉，《新華文摘》8（1980），頁185-187。

巴金：〈四十三 懷念烈文〉，《巴金選集》第9卷：新聲及其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頁639-647。

巴金：〈關於麗尼同志〉，《隨想錄》，北京：三聯書店，1982，頁63-69。

王小平：《跨海知識份子個案研究——以許壽裳、黎烈文、臺靜農為中心的考察》，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

周立民：〈不多取一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書信中的黎烈文與巴金〉，《書城》2

- (2008), 頁 52-58。
- 唐弢：〈紀念一個友人——《自由談雜文選》代序〉，《魯迅研究月刊》3 (1986)，頁 7-8，21。
- 康詠秋：《黎烈文評傳》，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 張明：〈在臺灣的作家〉，《臺灣新生報》第 8 版，1948 年 3 月 13 日。
- 張靜廬：《中國小說史大綱》，上海：泰東圖書館，1920。
- 曹聚仁：〈我與黎烈文〉，《我與我的世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頁 375。
- 曹聚仁：〈黎烈文在臺北〉，《天一閣人物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321。
- 莫昭平：〈黎烈文譯著改頭換面 十餘年渾沌今朝曝光〉，《中國時報》第 22 版（開卷），1988 年 11 月 28 日。
- 莫昭平：〈還黎烈文譯著本來面目〉，《中國時報》第 22 版（開卷），1989 年 1 月 23 日。
- 莫昭平：〈黎烈文餘波 50 年前的譯本現在還好讀嗎？〉，《中國時報》第 22 版（開卷），1989 年 1 月 23 日。
- 許鈞：〈社會、語言及其它——讀海峽彼岸的《紅與黑》〉，《現代外語》1 (1997)，頁 38-42。
- 郭風：〈記黎烈文〉，《特區文學》1 (1989)，頁 113-116。
- 陳子善：〈四見文學巨匠——追憶巴老〉，《素描》，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頁 3-9。
- 陳子善：《邊緣小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
- 陳雲海：〈「達五」是廖沫沙的筆名〉，《新文學史料》4 (1983)，頁 131。
- 尉天聰：〈臺灣文學傳薪人：追念何欣先生〉，《聯合報》第 37 版，1998 年 9 月 21-22 日。
- 寒山碧：〈黎烈文之死〉，《中國作家作品瑣談》，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1984，頁 56-59。
- 黃景星：〈請《冰島漁夫》做旁證：黎烈文原譯和修改本有何不同？〉，《中國時報》第 22 版（開卷），1988 年 11 月 28 日。

楊錦麟：《李萬居評傳》，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

廖沫沙：〈我在三十年代寫的兩篇雜文〉，《新文學史料》2（1984），頁40-43。

趙家欣：《風雨故人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蔡嵩林：〈中國的文學近況〉，《臺灣文藝》2：7（1935.7），頁186-192。

黎烈師：〈懷念長兄黎烈文〉，《源流》1（1984.5），頁41-44。

穆中南：〈為黎烈文先生遺著出版祝賀〉，《文壇》163（1974.1），頁6-10。

「譯文網 Babel」。網址：<http://babel.ch.ntnu.edu.tw/Babel/company/company01.html>

（2012年8月28日上網）。



情形，是如書中描寫的沒有兩極。作者之稱  
作「譯者」也並非完全掉時間。文化社來出  
版者，即這書也許是得「作」一星，不知古  
時有新興的書序或出版社，或出版這書，  
做「作者」而向拉筆行奉稿之時，譯者必心  
替我介紹介紹。（那書曾由路近社出版過三冊，  
這字字刪，奇161）西，說說這社已停稿，  
時稿）少時多仲是抽抽的，研於支一平物從最作，  
不研於支也譯者肉傷，不這生娘的書名安前傳佳。  
我現在寫書沒卷子很忙，剩下一星一時間，  
這「十稿」也說完了，沒有而得譯是東西，真  
是憾事！不事年以研得大的而如該送去地  
兒不，粵事也研抽宜給少平稿物字之稿。  
無、物  
又好！  
2月2日

